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人文地理学

張 同 鑄

(南京大学地理系)

一. 前 言

長期以來，在學術文化領域中，不斷進行着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的鬥爭，這一鬥爭，反映了真理與非真理、科學與偽科學間的衝突，也反映了先進無產階級和沒落資產階級間的衝突。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學術思想是徹頭徹尾服務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現在，它是服務於壟斷資本利益的東西，它是科學前進中的障礙，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

地理學中的人文地理學，就屬於這類偽科學的思想體系。人文地理學是流行於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帝國主義思想武器之一，它以研究自然與人生、即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為主題，散佈地理環境決定人生活動、決定社會發展的思想毒素。四十年來，它在舊中國地理學界已建立了牢固的統治，直至今天，仍然沒有從我們地理工作者的思想中徹底予以清除。我們必須和這種唯心的反動地理思想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揭露它，批判它，並最後的肅清它。不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地理科學就不能充分發展，地理科學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就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充盈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文地理學種種錯誤理論，都是一些為資產階級辯護的謊言，我們沒有必要對它們一一加以分析與揭露。在本文中，作者僅就人文地理學幾個主要方面進行分析批判。文中較多徵引的資產階級地理學家著作，以他們在資產階級地理學界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並對舊中國的地理學界起着深刻影響的為限。顯然，這樣作法在分析批判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不夠的，作者希望藉此引起我國地理工作者進一步的重視，以共同的力量肅清人文地理學思想體系的殘餘，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地理科學的勝利發展，打清前進的道路。

二. 人文地理學的產生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說，揭示了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歸因於物質生

產狀況的根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指出了正確的道路。人文地理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地理學進一步發展過程中的產物。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雖是庸俗的地理決定論，但它的各種表現形態，則從屬於一定時期的社會經濟條件，服務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我們有必要簡略地考察一下人文地理學發展過程中的歷史背景。

以自然環境解釋社會現象的思想，在人類歷史早期，就已存在，但對於這一觀點作具體而系統的論述，則始於18世紀法國的孟德斯鳩。孟德斯鳩在他的“法律精神”一書中，發揮了氣候決定人生的觀點，認為人類的風習和宗教信仰、各個民族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首先由氣候的特殊性所決定。這種思想，曾得到廣泛的傳播。

何以這種“理論”產生於18世紀，並突出的見於法國？這是與資本主義的成長發展密切相關的。

資本主義時代開始於16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表現為生產力的發展，由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並促進它和舊的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導致政治制度的變革。例如17世紀的荷蘭和英國，都先後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

但歐洲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是不平衡的，當英國工農業的生產急劇資本主義化的時候，德國的容克地主經濟尚佔統治地位，帝俄還牢固地存在着農奴制度，其資本主義因素都還薄弱。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過於德俄而不及英國，那時法國東北部以及西部和南部沿海城市都發展着大規模的企業，農村工業廣泛流行，對外貿易也頗為發達。但法國在政治上在宗教上都處於強力束縛之中，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統治，天主教對新教的壓迫，處處形成了舊的統治階級（地主和僧侶）和新的資產階級（以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手工業無產階級）間的尖銳矛盾，使法國成為新興生產力與瀕於崩解的舊生產關係激烈衝突的國度。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被推動前進了，天文學、機械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都復興起來，而頻繁的世界貿易，使得人們的地理知識也更加豐富了。這些進步，促進了唯物論哲學的抬頭，並使它與封建社會中的宗教思想與神祕主義之間的對立，更趨激化。

由此可見，17—18世紀西歐各國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的矛盾及其轉化，表現為新舊哲學思想、新舊政治觀點的對抗，這種對抗，首先出現於矛盾最尖銳的法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法國啟蒙學派，從不同角度展開了反對封建主義一切力量和秩序的進攻，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孟德斯鳩的自然神論觀點（它與神祕主義相對

立)，就是在這一條件下產生的。

孟德斯鳩以後，各國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多發抒相同或類似的觀點，例如康德、黑格爾和侯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等人都把歷史的基礎建築在地理之上，代表典型的地理史觀¹⁾。19世紀，地理決定論思想得到了更廣泛的發展，著名的“英國文化史”作者卜克爾(Henry Buckle)擴大了地理因素的範圍，將它歸結為氣候、食物、土壤和一般自然面貌四類，認為它們可以“決定”人類勞動的性質、思維和性格的形成、民族富裕的情況、宗教的產生和存在。甚至社會財富的分配，好像也要“服從於特殊的自然法則”。法國的列普來(F. Leplay)及其思想繼承者們從地理環境限制了工作種類、工作至少部分地形成了社會組織的思想出發，認為社會組織和活動必然地為它們的自然環境所決定。地理決定論在俄國同樣有著很多的擁護者，培爾、史恰波夫、梭洛維約夫、密奇尼柯夫、克琉徹夫斯基等可為代表。他們除了重複西歐地理學派的老調外，還把水的因素作為“歷史的真正動力”²⁾。

流行於當時社會學中的地理決定論，也順利地侵入發展中的地理學領域，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指導思想。並賦予人文地理學以反動性質。

資產階級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李特爾(Karl Ritter, 1779—1859)曾受康德思想的強烈影響，其自然統一體觀念，把人文現象和自然現象納入同一範疇，並從其中尋求相互的因果關係。例如他在柏林大學所作的講演中，對於各洲的大小、形狀、構成及氣候情況作了系統的敘述，並特別表明這些情形在歷史各階段中如何決定各大陸民族的發展。可以具體說明他的思想面貌。

被稱為人文地理學“開山祖師”的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資產階級地理學家認為他是文化地理學科學系統的建立者³⁾。他的代表著作“人類地理學”(第一卷1882年出版，第二卷1891年出版)是在李特爾思想基礎上，接受達爾文進化論的思想寫成，他把研究生物分佈所得的基本觀念，用來說明人類分佈的現象。拉采爾的另一重要著作，是被臭名昭彰的地緣政治學奉為經典的“政治地理學”(出版於1897年)。

拉采爾是個徹底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者，他認為只有注意作為人生活動的真正“基礎”的地理環境，才能了解和平的經濟生活，才能了解戰爭。(此項主張見於其所著“政治地理學”)“拉采爾把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歸結為四個方面：(i)直接的生理的影響；

1) 康德認為“地理是歷史的基礎”，黑格爾在其“世界史的地理基礎”一文中表示了相同的觀點，侯爾德謂“歷史是行動中的地理”。三人對於歷史發展的看法基本一致。

2) 詳見伊凡諾夫·歐姆斯基：“歷史唯物主義論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中譯本，第39—50頁。

3) 參看哈特向：地理學的木質，第90頁。引斯密特語。

(ii)心理的影响;(iii)對於人類社会組織和經濟發達的影响;(iv)支配人類的遷徙及其最後的分佈之影响。在拉采尔的心目中,地理环境有着控制一切的力量,“它盲目而野蛮地支配着人類的命运。”¹⁾(拉采尔語)

拉采尔这一錯誤思想,是和当时資產階級的要求相適應的。19世紀末期,資本主义已開始進入壟斷資本主义階段,“週期重複發生而愈益兇猛地危及全部資產階級社会生存的商業危机”²⁾,說明資本主义社会生產力和資本主义生產關係的矛盾已發展到驚人的程度。此時,德國的資本主义迅速發展,工業生產已超過英國,躍居歐洲第一位,德國當時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無產階級,要求在革命鬥爭中起獨立的歷史作用。因此,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拉采尔等人,就緊緊抓住地理決定論这一武器,把一切命定於自然,以便實質上為資產階級的剝削辯護。

拉采尔的思想在德國有着不少的繼承人,瓦格納(H.Wagner)、赫特納(A.Hettner)、史呂脫(O.Schlüter)、弗里德里赫(E.Friedrich)等可為代表。拉采尔的觀點,也迅速為英美等發達的資本主义國家所接受,美國的森普爾(E.C.Semple)是其重要的傳播者,她的“地理环境之影响”和“美國歷史及其地理条件”二書,就是全面地介紹並發揮拉采尔論點的作品。至於英法諸國的人地學著作,其中一大部分實受拉采尔的影响³⁾。騷爾(C. O. Sauer)認為,“拉采尔學說之影响,見於德國本境者,反不若見諸他國者為多。美國有森普爾,英國有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皆承襲拉氏之後,以發揮自然影响人生之學說”⁴⁾,我們知道,終森普爾一生(至1942年),一直保持着她在美國地理學界的權威地位,而美國的泰勒(G.Taylor)、亨丁頓(E.Huntington)等人都是環境論的重要代表,可見拉采尔的地理決定論思想,起着怎樣深廣的影响。

拉采尔的武斷必然論觀點,雖然流行迅速,但很快就遭到資產階級學者的反對與批評。因此,在拉采尔以後不久,又產生了法國的人地學派——或然論。

我們知道,19世紀最後三十年代,是科學技術飛躍進步的時期,1873年的資本主义經濟危機以後,掀起了促進新的生產方法的技術革新大浪潮,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加速地改變了社会經濟的面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資產階級佔得統治階級地位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却比先前一切世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宏偉

1) 拉采尔雖然也提到人可以彌補自然条件的缺陷,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上,則完全加以漠視。

2) 共產黨宣言,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43頁。

3) 參看白呂納:人地學原理。鍾山書局譯本(下同),第39頁。

4) 騷爾:西洋人地學晚近之發展。載新地學,第80頁。

得多”¹⁾。人們清楚地看到，人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着亘古未有的巨大作用，並非听命於自然，這就使得“必然論”的論點，不能令人相信。

其次，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衝突更加廣泛深刻起來。在國內，有財富更加集中與無產階級更加貧困、更加壯大的矛盾；在國際，有財政寡頭間爭奪原料基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等等的矛盾，有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壓榨與殖民地人民反抗宗主國的矛盾。這些複雜的社會現象，也遠非單純的地理環境所可解釋。

最後，馬克思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發現，徹底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永恆的偽說。而當時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則以實證論最為廣泛流行。實證論的創始者法國哲學家孔德（A. Comte）站在休謨的懷疑論和唯心論的立場，否認世界的可知性，認為一切處於感性認識範圍以外的東西，都是不可理解的。孔德斷言觀念支配世界，思維的發展決定全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孔德露骨地代表着已經成為反動的資產階級觀點，而與馬克思的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相對立。實證論的思想，就從哲學上影響了當時資產階級的學術界。

法國的人地學派——或然論就是在上述條件下產生的。

人地學派創於 20 世紀二十年代，以法國的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呂納（J. Brunhes）、費伯（Lucien Febvre）等人為代表。人地學派修正了拉采爾的“必然論”，標榜“或然論”。出身於歷史學家的白蘭士，認為“環境包含着許多的或然性，這些或然性的利用，則完全依於人類的選擇。一種社會的複合深入於習慣，因此可以使一定的或然性得到了否定的結果。總之，顯著的心理学的事實，與氣候和土地對於人類行為的固執的命定的支配，正是一種對照”²⁾。費伯在其“歷史之地學的導言”一書中，對“必然論”猛烈攻擊，並創立了“或然論”這一名詞。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一書集中而全面地表達了人地學派的觀點，他認為人地關係是相互的，不是片面的。“天定足以勝人，人定亦足以勝天”。而人地關係的變化，則以心理因素為轉移（詳後）。白呂納基於他皮相的觀察，把人地關係的事實按所謂“純然地學的”分類原則分為三綱六目：（1）地面上建設事業之不能生產者：房屋與道路；（2）動植物的利用事業：種植與畜牧；（3）經濟上的破壞事業：開礦、動植物的採取³⁾。他還選擇了“人類社會中的小島”（沙漠中小島和山中小島）進行考察，企圖証驗“自然與人生間嚴正的地理關係”。但我們知

1) 共產黨宣言。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 42 頁。

2) 狄鐸生、霍瓦士（楚陶南譯）：地理學發達史。中華書局出版，第 273 頁引。

3) 人地學原理。第 55—60 頁。

道,這並沒有真正說明問題。

人地學派思想在美國頗為風行(“人地學原理”英譯本於1920年在美国出版),鮑曼(I. Bowman)、亨丁頓(E. Huntington)、巴羅士(Barrows)、湯瑪斯(O. J. Thomas)、騷爾等人都是美國重要的人文地理學家,亨丁頓和克興合著的“人生地理學原理”是美國的一本通俗而流行極廣的作品,它和鮑曼的“地理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等書,對於舊中國地理學界都起着很大的影響。

英國的人地學也十分發達,一般認為人地關係在於“調整”,在於“適應”,赫伯生(A. J. Herbertson)、麥金德、弗留爾(H. J. Fleure)、斐格萊(J. Fairgrieve)、羅克斯貝(P. M. Roxby)等人可為代表。

必須指出,人地學派只是“必然論”的變種,它的真實面目仍然是環境決定論與主觀唯心主義。目前人地學思想正充當資產階級忠順的奴才,為資產階級的罪惡活動進行辯護。因此,必須堅決予以揭露。

地緣政治學是人文地理學的另一表現形式,是直接服務於壟斷資本利益的工具。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的剝削與奴役,更加普遍與深刻起來,“帝國主義意味著資本已超越民族國家的範圍,它意味著在新的歷史基礎上民族壓迫的擴大和尖銳化”。(列寧語)我們知道,正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的殖民地已被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得一乾二淨。

然而,殖民地的分割是極不平衡的。例如法國的殖民地約等於德、日殖民地總和的兩倍,英國的魔掌則伸到全世界。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要為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絕對規律所打破。

因此,“重新瓜分世界”,成為年青的強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要求。地緣政治學正是反映這種要求。

德國更加具備產生這一偽科學的客觀條件。

1871年德意志統一以後,國內資本主義得到非常迅速的發展,在19世紀末葉,德國工業就已據有歐洲第一位。德國的壟斷資本發展起來,產生了擴大國外市場和工業原料地的需要。由反動政客、軍官和大工業資本家所組成的“泛德意志聯盟”,就為對外掠奪進行宣傳鼓吹,要求歐、亞、非、美等洲的土地。德國的大部分報紙刊物也同樣宣傳這一狂妄思想。顯然,這一股兇惡的洪流,不能不反映在各種社會科學上面。

其次,德國自宗教改革以後,國內長期陷於混戰狀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是在不斷的掠奪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軍事國家。以黑格爾等人的權力哲學為基礎的普魯士反動

的軍國主義思想和日耳曼的狹隘民族主義精神相結合，構成了向外擴張統治其他民族的思想根源，由於經濟上歷史上的必然性而產生的德意志帝國的成長合併過程，則被它利用為進一步政治擴張的論據。因此，就促進形成了地緣政治學這一荒謬的思想體系。

其三，19世紀後半期，德國的庸俗唯物論哲學思想得到廣泛流行。他們錯誤地把達爾文的生物學的規律移植到社會生活裏來，把一切階級的區分、把進步和落後人民間的區別歸結為由於所受的营养料性質之不同而造成的腦力的豐富或貧乏。實証論哲學代表之一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同樣也鼓吹社會“有機論”，把人類社會和生物有機體等同看待，歌頌階級社會的“合理”與“完滿”。這種庸俗化了的達爾文主義的泛濫，對於地緣政治學的中心思想——國家有機體論的形成，同樣也有積極的意義。

地緣政治學的“始祖”，也是這個拉采爾。他在其“政治地理學”中，用地理環境解釋政治現象，同時也用生物學規律說明國家發展的过程。我們認為，處於德國當時社會條件之下，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特別是動物學家而又服過軍役的拉采爾，其易於接受上述思想的影響，是十分自然的。

拉采爾基於其所捏造的“國家有機體”的命題，把國家的空間擴張作為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規律”。拉采爾提出國家的三個地理因素：領土範圍、地理位置、國界性質，就完全適合於“國家有機體”這一概念。

適應於當時德國資產階級和地主貴族的領土擴張要求，拉采爾胡謔了“地理統一體”這一概念，把德國和它的鄰邦（荷蘭、法國，以及多瑙河流域各國等）“統一”在一個“地理單位”之中，認為這個“地理單位”，政治上應該隸屬於一個國家（當然他是指的德國）。這樣，拉采爾就從地理學的見地上“論證”了德國向外侵略的合法與正確。

本世紀初，由於德國壟斷資本的進一步發展，它的領土擴張野心更加強烈了。於是拉采爾的上述觀點，被全盤接受下來並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德帝國主義者的忠順奴僕瑞典人吉倫(R. Kjellen, 1864—1922)在其“國家有機體論”(1916年出版)一書中，就公開為德國的擴張鼓吹，在該書中，吉倫還創立了“地緣政治學”這一名詞。

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地緣政治學達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豪斯浩菲爾(K. Haushofer)為首的德國地緣政治學家，為了迎合其主子們的要求，在著作中強烈地要求“生存空間”，他們不但要求在凡爾賽和約中失去的土地和殖民地，而且把甚至大半個歐洲的領土包括進這個“生存空間”範圍。很簡單，一切他們這類的叫囂，不過是為德國壟斷資本、容克貴族與軍國主義者的領土擴張要求搜尋根據而已。

應該指出，“地緣政治學”這一偽科學，在各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英國、日本（指二次大戰以前）等國，都有翻版，而且被改頭換面，以符合於各該國家各該

阶段的具体利益。美國、英國早在本世紀初就濫用了地緣政治學的“理論”，英國的麥金德，美國的馬罕是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日本較遲地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在其向外侵略的過程中，地緣政治學也跟着得到傳播。臭名遠揚的“大東亞共榮圈”，就是它在日本的翻版“傑作”。

在第二次大戰後期，地緣政治學又在美國風行起來了，美國的“學者”、教授、政論家、軍人日益眾多地鼓吹地緣政治學，他們在“戰略防禦”、“空權時代”的掩飾下，公開宣傳無限制的擴張。而這只不過是服務於美國財政寡頭的利益，企圖達到由美國人來統治世界的幻想而已。

人文地理學發展到了地緣政治學階段，已經和科學沒有絲毫共同之處，它表現了和現階段壟斷資本相同的腐朽性與垂死性，因此必然也隨着帝國主義的崩潰而徹底消滅。

三. 人文地理學怎樣為帝國主義服務

人文地理學思想的必然為帝國主義服務，是由上層建築對於基礎底積極作用的原理所決定的。人文地理學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方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對於人和自然關係的歪曲

人和自然的關係問題，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中重要的理論問題之一。在這一問題上，人文地理學中的“必然論”和“或然論”的觀點都是唯心的、錯誤的。

首先，人文地理學家認為人類的活動，是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在環境面前，人們只有調適選擇的餘地，因此地理學不過是一門“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例如森普爾就把各地居民的不同活動、宗教信仰、對外侵略都認為由大地造成。她說：“人為大地之一種產物，……大地鞠育之，衣食之，委以工作，導其思想，臨之以難以壯其身體，強其心智，畀以航海問題或灌溉問題而又授以種種暗示以便解決之焉。……”¹⁾美國反動地理學家亨丁頓突出地發揮了“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他說，動物、植物和人類都要服從於偉大的自然規律，只有承認人是一種生物，要服屬於動植物的同一生物規律，然後對於經濟地理才有真實的理解²⁾。亨丁頓提出了一張人生地理要素表，其中分“天然環境”(包括地位、地形、水澤、土壤與礦物、氣候、植物、動物等)和“人生反應”(包括物欲、職業、才力、文化等)兩大類，從而把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都歸結為對自然環境的“反應”。他認為非洲中部彼格密人的遊獵、拉布拉達海濱的捕魚、英國的工業、荷蘭的商業等等都由於地理環境所造成。他的公式是：地理環境影響健康和精力，健康精力影響人的動

1) 森普爾：地理環境之影響。中譯本，第1頁。

2) 亨丁頓：經濟地理學原理。第17頁。

惰，而勤惰又影響人的才力，因此就產生了熱帶人民的“低能”和溫帶人民的“精幹”。亨丁頓甚至把政治觀念也取決於地理環境……¹⁾。於是，在這些人的筆下，自然獲得了絕對的意義，而人類僅僅成為環境中的插曲²⁾。

其次，與“人類生態學”的荒唐概念緊密聯繫的，是地理環境決定社會發展說。英國地理學家裴格萊認為“各種地理條件曾支配歷史的整個進程。”³⁾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倫納(D. Renner)同樣主張社會上一切制度、觀念和機構等等都是人類對其周圍環境適應下成長的結果。

人文地理學“說明”這一“論點”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例如森普爾捏造了“地理關係進化”的說法，認為文明程度提高，地理環境的作用性質就會改變（這裏，森普爾錯誤地把地理環境作用的改變，不歸諸人類社會的進步，而歸之於地理環境本身）。鮑曼認為“地面事實”的改變是由於科學和實驗的進步，引起了知識和思想的改變所造成。亨丁頓重複他那氣候萬能的老調，鼓吹氣旋型氣候的優越。他杜撰了兩幅地圖：一幅是氣候能力分佈圖，另一幅是進步文明分佈圖，他把美國大部、西歐、意大利北部、蘇聯最西部分別為氣候能力“最高”因而文明也是“最高”的地區，把蘇聯絕大部分和中國列於“中等”，印度、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尼西亞、巴西等地列為“最低”⁴⁾。亨丁頓把氣候因素作為社會進步或落後的原因，其觀點與德國反動地理學家赫特納所謂“經濟是地域的屬性”的觀點本質一致。

人文地理學的上述觀點是根本錯誤的，其錯誤的實質是把人和動物的運動形式混為一談，無視於其間本質的區別。當然，作為一個個體動物來說，人是一個自然體，他要服從於自然規律；但在人類的發展中，人們憑藉於製造工具的勞動，和動物之間的差別就愈來愈遠。由於勞動，“……人也學會了在任何一種氣候下生活。人分佈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是唯一能獨立自主地這樣作的動物。”“動物僅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以他所引起的改變來迫使自然界服務於他自己的目的，來支配自然界。”⁵⁾因此，恩格斯說：“最初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基本的方面，都和動物本身一樣的不自由，可是每一文化的進步，都是向着自由的進步。”⁶⁾人的這種積極創造作用，絕非動物所能辦到，這是極其明顯的。

1) 見亨丁頓、克興合著：人生地理學原理。

2) 按裴蒂(R. Peattie)，在其“人類命運中的地理”一書中即抱此主張。

3) 裴格萊：地理與世界霸權，緒言。

4) 參看亨丁頓：文明與氣候。

5)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143，145頁。

6) 恩格斯：反杜林論。中國人民大學版，第193頁。

其次,人是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人在社會中營集體生活,其行動直接依賴於社會。例如人們的社會分工情況和不同階級的生活水平,即由社會所決定。另外,勞動資料是通過人們的勞動創造出來,它和社會發展階段密切關聯,和自然條件的關係是較少的;而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又決定了人們不同時期的活動形式與內容。因此,根據自然條件不可能正確描繪出人們活動的面貌。

我們這樣說,絕非漠視自然條件的影響,由於人們的一切生產活動必須作用於自然界,一定自然條件對於人們活動的性質的一定影響是肯定存在的,但歸根結底,自然界僅僅提供人們以可能性,而變可能性為現實性,以及把可能性變為怎樣的現實性,則是個歷史範疇。只是主要由於生產的進步,以及各地區生產水平的差殊,才引起性質複雜的社會活動。如果非洲彼格密人的遊獵,只是由於環境造成,何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的同一環境下,其居民活動能由 19 世紀初葉的漁獵業發展而為 20 世紀的多种職業?英國的礦產,荷蘭的地理位置,從來就是如此,但在羅馬帝國時代,二國還處於蠻荒狀態,何以當時的環境,就沒有起作用呢?因此,如果由於承認環境的影響,而把它絕對化起來,說它有什麼控制作用,那是極不正確的。在一定意義上,地理環境本身也是個歷史範疇。由於人們長期生產勞動的結果,在今天的地球上,已經很少沒有經過人力改變的純粹自然景觀,亦即人們的勞動對象,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人們勞動的直接間接產物。馬克思曾經正確地指出:除了採掘業、狩獵業、漁業和農業中的開墾处女地等等其勞動對象是自然所提供的以外,“各產業部門所處理的對象、原料,都是曾經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農業中的種子,就是這樣,動植物……不僅它們自身也許是前年度勞動的生產物,它們現在的形態又還是許多代,在人類控制下,以人類勞動為媒介而繼續發生變形的生產物。”¹⁾例如革命前俄國的哈薩克,原來是個落後的游牧地區,而現在在蘇維埃政權下,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不僅發展着農業,而且也發展了工業,哈薩克人一直改變着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地理環境,而使哈薩克的自然與經濟面貌起了巨大的變化。這一事實,可以充分証實我們的上述論點,駁斥了資產階級地理學家關於哈薩克的自然環境只宜於進行游牧的謊言。

最後,地理環境雖是“社會發展底經常必要條件之一”,對社會發展進程起加速或延緩的作用,但絕無決定社會發展的作用。“因為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為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²⁾如果說溫帶文化的進步只是由於自然條件良好,熱帶地區的落後只是由於氣候過度炎熱,何以歷史上亞洲的印

1) 資本論。第一卷,第 197 頁,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

2)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 150 頁。

度、南美的印加帝國成為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而亨丁頓所極口頌揚的氣旋型氣候大部分地區，當時反而瞠乎其後呢？而且，美國的氣旋型氣候早就存在，那裏的印第安人卻一直是個落後的民族。亨丁頓說氣旋型氣候適於生長營養好的植物，因而那裏文化高，但亨丁頓自己也承認：“除了玉蜀黍和馬鈴薯而外，所有美國人的主要食品，沒有一樣不是從亞洲而來”。而早已擁有這些食品的亞洲，在亨丁頓的地圖上，卻屬於“中等”、“極低”文明之列。事實上，亞洲各國，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參差不齊，中國只是在六年以前，在同一地理環境中，建立了高於美國的社會制度。這又應該怎樣解釋呢？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決定社會發展的動力的看法，是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的。這是說，為社會的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才是社會發展的主要的、決定的因素，它決定着社會制度以及社會之從一種社會經濟形態轉化為另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斯大林在其“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透闢地論證了生產如何決定着社會的發展：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發生變更和發展起來，然後，通過革命，人們的生產關係也與這些變更相適應而發生變更；同時，這種依賴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反過來又影響到生產力，加速或延緩其發展。馬克思寫道：“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餘地的那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死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們所藉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胞胎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¹⁾因此，“社會發展史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²⁾例如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我們要在短時期內走完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經歷的道路，就是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發展的現實證明。

我們認為，地理環境只是社會發展之自然的前提，礦藏的豐富或貧乏、氣候的是否良好、土壤的是否肥沃、以及交通位置的是否便利，無疑都影響到社會發展，但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過社會生產方式進行的。人類社會愈進步，人們控制地理環境的能力愈強大，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之形式與程度也不斷有所改變。恩格斯寫道：“蒸汽機才使英國廣闊的煤層有了重要意義；現在機器的製造才開始，人們對鐵礦也就發生了新興趣，這些鐵礦供給製造機器的原料；羊毛的消費增加了，英國的牧羊業興盛起來，羊毛、亞麻和絲的輸入增加了，英國的貿易艦隊因而擴大。鐵的生產更特別突出。”³⁾我們知道，只是在水上運輸工具發明以後，河流與海洋才由民族間的障礙成為民族間聯系的坦途；只是由於化學的進步（這是由於生產發展的要求所引起

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341頁。

2)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153頁。

3)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國人民大學版，第42頁。

的),若干植物、礦物資源才取得了新的利用價值;素称“中國的憂患”的黄河,只是在新中國的社會制度下,才能發揮無盡的潛能,为人民造福,因此,我們的觀點是和人文地理學者所謂的“地理關係進化”、“間接影响”、“心理影响”等等說法根本不同的。

地理环境和人類社會處於相互影响之中,地理环境对人類社會的影响以及人類社會之改变地理环境,不是兩種獨立的过程,而是影响社會發展的統一的、相互作用过程的兩個不同方面。人文地理學者故意混淆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關於此點,後面還將分析),企圖在“科学”的幌子下,把社會經濟的落後,誘之於自然条件,从思想上解除人民的武裝,以証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恒”与“合理”,以鞏固財政寡頭的統治地位。但这种歪曲,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照妖鏡下,已經原形畢露,因此,我們要進一步加以揭露,以加速它的毀滅。

人文地理學中的“必然論”,当其反对封建意識形態,推動歷史前進時,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当其充當資產階級工具來对待勞動者階級時,就成為徹底反動的東西。這已無庸爭辯。可是,有人認為“或然論”的觀點比“必然論”遠為進步,這是十分皮相的,因而也是不正確的看法,應該進一步加以說明。

人地學派的基本思想是把社會現象的基因歸之於自然環境和心理因素(或選擇力,二者實一)兩個方面。他們認為:人地關係是無定的,因為它因經常變化的人類需要與慾望而定。費伯認為在自然界中充滿着或然性,而人是這些或然性的主宰。白呂納說:“人地學事實不能單在地理因素中找求完滿的解釋或相應的原理,……各種人地學研究均須以此種複雜難究的心理因素為中心,使自然界中各種事實的分佈和相應與自然和人類均能發生關係。”¹⁾這裏,“或然論”者,似乎與“必然論”者立於“針鋒相對”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說,“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²⁾如果按人地學派的說法,把人類社會現象的過程作為自然和心理矛盾鬥爭的結果加以考察(當然,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詳後),那麼,在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之中,那個因素是決定的、主導的方面呢?對於這一問題,“或然論”者的措詞是極為含混的。一方面,他們說:“心理因素實在是地理事實的源流,人類與自然間的媒介,又可以說是一切行為的指導者。”³⁾似乎心理因素在起着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他們又說:“自然環境之勢力,不惟可以決定生產狀

1) 人地學原理。第644頁。

2)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冊,第788頁。

3) 人地學原理。第637頁。

況，即貿易之方針，人民之好尚，亦往往隨天然形勢而轉移，而人口之分佈，職業之性質，都市之地位，產業之區域，亦因此而異其面目。”¹⁾ “即從來認為奇異不經的政治事實，實在也自有自然環境為其基礎。”²⁾ 這樣，自然因素又是主要的東西了。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們寫道：“人定雖然似乎勝天，但實際天定仍能勝人。……人類活動的方式和結果，固受環境的支配，即其活動範圍，也很受自然環境的影響。”³⁾ “人類開發地力愈烈，與環境的關係愈密，則人類受自然的控制反愈益深切。”⁴⁾ 這裏，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們所謂起決定作用的東西，並非心理而是自然。而且他們所謂的心理因素，一部分也是環境的產物，例如白呂納甚至認為個人主義思想也是由環境造成，無怪乎日人川西正鑑把孟德斯鳩以下的美、英、法、德、日等國的人文地理學家統統歸入地理決定論旗幟之下了。美國的哈特向寫道：“近代各國的地理學，在根本方面都依賴於這一發展於德國的觀念（按即地理決定論觀念——作者）……法國、英國，尤其是日本的地理學家，其方法論乃至大部實際工作，都為這一觀念所壟斷。”⁵⁾ 白呂納等所苦心構築的偽裝工事，却由資產階級地理學界內部把它一腳踹通了。

“或然論”的作用，如克拉克(R.B. Clark)所稱，在於“有效地確定現代人類社會與其地理環境間的關係。”（這是說更易於辯解——作者）而它的效果，則表現為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反對⁶⁾，正因如此，“或然論”才橫流於資本主義世界，因而我們更應該予以徹底的揭穿。

（二）對於國內勞動人民的貧困與殖民地國家的落後的謊言

壟斷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國內表現為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加強以及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鬥爭的日趨尖銳，在國外表現為宗主國壓迫與奴役殖民地的加倍殘酷以及殖民地人民反抗奴役爭取解放的運動之高漲。這種對抗性矛盾的增長，從根本上動搖了資本主義陣地。正如列寧所指出：“資本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且到了凋謝腐朽的時代，此時資本主義已處在自己崩潰的前夜，已成熟到要讓位於社會主義的地步。”⁷⁾ 但資產階級並不甘願自動地退出歷史舞台，它還要動員它所掌握的一切工具（政府機關、法律、憲警、軍隊、學術思想……等）進行垂死的掙扎。人文地理學就充當了這一工具。

1) 白呂納：西洋人地學史。見新地學，第33頁。

2-4) 見人地學原理。第28, 561, 654頁。

5) 哈特向：地理學的本質。第121頁。

6) 白呂納：西洋人地學史引法國史家安西兒語稱：“既有白呂納、萬洛二教授忠告善導，對於盲目的唯物史觀起一反動，當不致再流於獨斷之病，蓋無可疑。”見新地學，第37頁。

7)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國文書館出版局版，第908頁。

人文地理学为帝国主义辯護的方式,是多种多样,以偽裝的科学面貌出現的。他們首先从馬尔薩斯人口論的虛假“原理”出發,以所謂“土地收益遞減律”为根据,“証实”“绝对人口过剩規律”的存在,然後从地理上“分析”,說明“人類僅適居於有限部分的环境中”¹⁾,从而“論証”所謂無限增加的人口与有限資源間矛盾的“不可克服”性,据他們看來,資源/人这一數值愈來愈小,飢餓、貧困、失業和一切社会災難,乃是無可避免的現象。

人文地理学家解決各國的所謂“人口問題”的方法是因对象而不同的。對於帝國主義國家,他們就鼓吹拓地殖民,好像这是地理上的必然性。例如白呂納論述比利時,奧尔却德(J. E. Orchard)、鮑曼談到日本,都是由此出發。²⁾ 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把一切貧困歸之於環境的天定,唯一的办法是要求這些國家的人民忍受所有的困難。例如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伏格特(W. Vogt)在其“生存之路”一書中寫道:“从全人類的觀點來看,我認為中國的飢餓不僅是應該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恩格倫論述東南亞地區的情況時,也抱持類似的論點。³⁾

為了辯解廣大勞動人民的貧困,美國反動地理學家萊特(R. U. Light)寫道:“在這非常拥挤的世界裏,糧食生產已經不足供養它的人羣。”“飢餓對這個世界說來是並不新奇的,因為災難的地區經常存在,過去把信心寄託在移民到新的待開發地區上面,……但現在新土地的移民運動已經緩慢得幾乎停止了”。⁴⁾ 與這一捏造相適應,新馬爾薩斯分子公開要求以強制辦法消滅一切“遺傳上屬於劣種”的人,要求消除勞動人民的生殖力。新馬爾薩斯分子聲稱必須限制殖民地和附屬國,首先是印度、錫蘭、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的生殖率,美國的新馬爾薩斯分子還要求縮減美帝僕從國家的人口。⁵⁾ 美國的伏格特、法國的列布(И. Пель)、英國的羅素(B. Russel)等反動透頂分子異口同聲地叫囂:防止人口过剩的辦法,是在戰爭和減低生殖率之間選擇一途。⁶⁾ 這些吃人野獸,實質上不過是在為帝國主義的戰爭叫囂尋找藉口罷了。

人文地理學者還接受種族論者的謬說,從身體特徵上“証明”白色人種的“高貴”和

1) 例如亨丁頓著(薛貽源譯):人類之居住地帶(地理教學,1947年6月号)一文即是此種性質,其他例証也很多。

2) 參看白呂納著“人地學原理”。第642頁。奧爾却德:“日本人口問題之壓迫”(譯載地理教學雜誌)及鮑曼:“戰後新世界”。(中譯本)第423—424頁。

3) 參看恩格倫:“民族發展的地理因素”。(中譯本)第343—344頁。

4) 萊特:拥挤的世界之地理。美國地理評論雜誌,1949年1月号。

5) 參看阿·波波夫:反動的人口論。學習譯叢,1953年第10期。

6) 參看盧卡舍夫:為反動派服務的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地理學(三聯書店譯本)。第87—89頁。

有色人種的“低劣”。並且從地理環境的作用上“找出”種族優劣的原因。例如上節所提到的亨丁頓的世界氣候上的能力分佈圖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在亨丁頓看來，“種族的分配，純然是地理上的關係”，亨丁頓把盎格魯薩克遜族稱為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據說是由於他們居住在氣溫多變化的氣旋型氣候地帶；熱帶民族的“低劣無能”，乃是炎熱而變化很少的氣候所造成。亨丁頓在其“文明與氣候”一書中，引証了下列捏造的事實：白種人遷移到巴哈馬羣島以後，經過三五代，就變成劣質的白人，和黑人相差無幾。但如把這種白人移到可以振作精神的氣候帶中，他們在精力上和創造力上似乎立刻就可以恢復他們在遺傳上的特點。

以上述“理論”為基礎，對於人類社會中貧困與落後現象，人文地理學家就可以任意地加以曲解。例如熱帶地區工業落後，亨丁頓說是由於熱帶人民的懶散，只能生產少量的剩餘生產物，因此人民購買力低下，使得工業不能發展¹⁾。舊中國工業落後的原因，是由於“人口又多，又少創造力，一般人都很貧苦，購買力很微小”²⁾。關於拉丁美洲工業，他們就說是由於資源和資本缺乏，居民文化水平太低，缺乏熟練的技術，因而得不到發展³⁾。而關於本國勞動人民的貧困，就歸因於他們是落後國家的移民，因此能力“低弱”⁴⁾。

我們必須嚴正指出：馬爾薩斯人口論、土地收益遞減律、種族主義等等，和庸俗地理主義一樣，都是不合事實的、反科學的東西，人文地理學把它們加以結合，只是表示四倍的捏造。

馬爾薩斯所杜撰的人口“法則”，從頭到尾都是荒謬的。現實證明，馬爾薩斯所謂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的說法，並無其事。例如資本主義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人口的增長，就有日趨減少的趨勢：在1800—1900年的100年間，歐洲人口增加了一倍多，19世紀後四十年西歐人口增加了36%，而在20世紀前40年，只增加了28%，到1940年，西歐人口幾乎不再增加。英、美人口的增長，同樣有着不同程度的降低。馬爾薩斯企圖證明“絕對的人口過剩規律”的存在，這也是徒然的，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完全能夠供給人類足夠的生活資料。比如英國以1913年對1688年相比，人口增加827.1%，財富增加4471.9%，收入增加5195.4%。美國以1910年對1880年相比，人口增加183.6%，財富增加373.5%，收入增加384.4%⁵⁾。財富和收入的增加，都比人口的增加快得多。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人口增加的規律是由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在

1) 看亨丁頓：《經濟地理學原理》。第15頁。

2) 亨丁頓：《人生地理學原理》。卷四，第49頁（萬有文庫本）。

3) 例如坦能朋（Tannenbaum）：《拉丁美洲的前途》。《經濟社會問題緒論》，1934。

4) 同頁，註2），卷三，第61—62頁。

5) 《經濟地理學參考資料（一）》，第110—111頁，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地理教研室編。

資本主義條件下，相對的人口過剩規律才是它真正的人口規律。一切的失業、貧困、飢饉等等，都不過是人口相對過剩規律的表現。

“土地收益遞減律”同樣是一種騙人的鬼話。恩格斯早就指出：“在人類支配下的生產力是巨大的，不可估計的。由於資本、勞動以及知識的運用，土地的生產率可以無止境地提高”¹⁾。偉大的蘇聯土壤學家威廉斯根據農業試驗結果指出：在資產階級試驗中，每一次增加植物生活條件（水分、養料、光、熱）之作用的遞減，並不是定律，而是違反了一切農業因素同等重要性這一基本科學定律之不可避免的結果。威廉斯寫道：“如果保證植物能有一切的生活條件，則它們的產量是無限量的”²⁾。威廉斯的科學結論，同時也充分論證了列寧駁斥這一“規律”的論點：“土地收益遞減底規律”決不適用於技術正在進步、生產方式正在變革的場合，它只對於技術仍然不變的場合有着非常相對的和有條件的適用性。“它是如此地相對的，以致不能說是農業底什麼‘規律’，甚至農業底什麼根本特徵。”列寧一針見血地寫道：“食物生產的困難並沒有增大，而是工人獲得食物底困難增大了——這種困難之增大，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抬高了地租和土地價格。……”³⁾不僅如此，由於資本主義的追逐最高利潤，過度的掠奪自然，引起土壤的嚴重侵蝕和土地肥力的下降，例如美國因土壤侵蝕而毀壞了或將毀壞四十多萬公頃的耕地，廣大的拉丁美洲，大部耕地都受到侵蝕，很多耕地因此荒廢。這一切情景，都構成勞動人民，特別是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普遍地破產和貧困的真正原因。

所謂整個地球已經“住滿了”的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根據普拉索洛夫院士（Л. И. Прасолов）的計算，世界上完全適於耕作的土地約為105億公頃，種植穀物、技術作物、蔬菜和其他農作物的土地還不足10億公頃。英國及其殖民地，播種面積和菓園葡萄園的面積，約佔全國面積5.1%，法國為3.1%，巴西為1.1%，而美國1940年所開墾的土地，只佔全國土地面積 $\frac{1}{4}$ 稍強⁴⁾。進一步來看，人文地理學家所宣傳的日本人口壓力也是沒有根據的，日本農業的潛力還是很大，其單位面積產量並未“達到頂點”，它的稻米和小麥的單位面積產額還不如世界上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它的可耕地也並未全部利用，據1948年日本國家計劃局的估計，日本宜於農耕但尚未利用的土地達550萬町（1町＝14.88市畝）以上，相當於日本目前耕地的總面積。

說殖民地附屬國的貧困落後由於人口過密，也是無稽之談。例如玻利維亞的人口

1) 馬恩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312頁。

2) 威廉斯：耕作學原理。中華書局譯本，第49—53頁。

3) 列寧：土地問題理論（上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3，75頁。

4) 盧卡舍夫：為反動派服務的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地理學（俄文版）。引用第92頁。

密度為每方哩 10 人，比屬剛果僅為每方哩 13 人。甚至像印度這樣人口稠密的國家，它的人口密度（250 人/方哩）也比英國（750 人/方哩）、比利時（800 人/方哩）或荷蘭（610 人/方哩）低得多。

最後，關於地理環境形成種族的“優秀”或“低劣”說，更是胡說八道。例如說熱帶人民“低能”、“懦弱”，首先在資產階級學者中就引起了反對。丹福司（Danforth）在其“熱帶生活為人類進化的一个因素”一文中寫道：“在夏威夷、澳大利亞、印度，以及熱帶其他地區的上萬個家族，不但生活得很健康，而且有着活潑、敏捷、善於生產的生命力。其工作效率，即使不是較高一些，也和他們住在寒冷的地區時相等。”在現實事例中，熱帶地區人民為爭取自由獨立所表現的自我犧牲精神、英雄主義，與不屈不撓氣概，更完全粉碎了這種污蔑。亨丁頓關於巴哈馬羣島上白人退化的說法，尤其荒唐可笑。大家知道，巴哈馬羣島是北回歸線附近的島嶼，並不是他所認為“不適居住的”赤道雨林氣候，如果亨丁頓的說話正確，則美國弗羅里達半島南部的白人應該統統搬家。亨丁頓說白人一回到可以“振作精神”的地區，就馬上可以恢復他們的“精力”和“創造力”，然則住居美國達幾百年之久的黑人，何以還被認為“低下”民族，仍舊受着美國反動分子的百般歧視與壓迫呢？

由此可見，人文地理學所宣傳的“理論”不過是些杜撰的謊言，目的在於為資本主義剝削勞動人民、奴役殖民地的罪惡行為，進行無恥的辯護。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勞動人民啼飢號寒、掙扎於飢餓線上的時候，美國的小麥、玉米和棉花的播種面積却在縮小，龐大數量的農產品如大豆、馬鈴薯、蘋果等等在以人為的方法加以銷毀，而 1954 年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的小麥儲存量達到 4,800 萬噸。這一尖銳矛盾，人文地理學家們是永遠也解釋不了的。斯大林說：“必須承認，如果一種經濟制度竟不知道怎樣來處置自己生產出來的多餘產品，而在羣眾普遍遭到貧困、失業、飢餓和破產的時候，却不得不把它們焚毀掉，那麼這種經濟制度本身就給宣判了死刑。”¹⁾但在殖民地獲得解放，並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例如中國，在和過去一般無二的地理環境中，一日千里地發展着自己的工業，我們的國家工業是在蘇聯無私的幫助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的基礎上進行的。正是由於生產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不斷得到提高，這對於人文地理學家的謊言，乃是一種無情的揭破。可以肯定，其他殖民地和附屬國在脫離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桎梏，由奴隸成為主人以後，它們的經濟面貌將同樣有着急劇的變化。

隨着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及全體勞動人民之間的

1)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十二卷，第 282 頁。

階級矛盾正急劇地尖銳化。罷工運動的浪潮日益擴大地遍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實際上已在解体。”(馬林科夫語) 1955 年 4 月亞非會議中所一致通過的反对殖民主義的決議,就是鐵的證明。

人文地理學為帝國主義辯護,正若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樣,絲毫也不能挽救它覆滅的命運。

(三) 對於帝國主義侵略行為的辯護

人文地理學在積極方面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東西,是把地理條件與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加以結合的地緣政治學。地緣政治學是多种反動理論(種族主義、權力哲學、軍國主義思想……)的複合體,而以地理決定論為其基石。德國地緣政治學首腦豪斯浩菲爾認為:“地緣政治學是關於政治現象的地理制約性的理論。”¹⁾ 這一定義,充分說明了它的基本出發點。有人把地緣政治學當做“應用地理學”,不是言之無因的。

地緣政治學的運用,早見於拉采爾的著作中,在本世紀初,英國的麥金德則是重要代表之一。麥金德特別強調地理位置和地勢因素在國家命運中的重要性,他從英國統治者對外侵略的要求出發,捏造了“大陸心臟”的概念,彷彿位於歐亞大陸的“大陸心臟”國家(特別是俄國),可以主宰世界²⁾。麥金德以此“概念”為基礎,虛構了所謂“俄羅斯威脅”,說俄國是“禍亂的搖籃”,從而“証實”侵略俄國的合理性。於是英國就可以加強對歐亞大陸沿海的海上控制,樹立其左右歐陸政治的實力基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的實力地位起了巨大變化,為了維繫大英帝國的海上聯系,英國必須取得美國武裝力量的支援,因此,麥金德在其“圓形世界與和平的獲得”一文(1943 年發表於外交季刊)中新提出了“大西洋統一體”的概念,把美國、加拿大、西歐諸國包括在一個單位中,麥金德強調了英國的大西洋中心地位,認為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和加拿大在進攻歐陸(實即蘇聯)的行動中,不能不倚靠英國。這裏,所謂“大西洋統一體”實際上是針對“大陸心臟”的蘇聯而進行的陰謀策動,仍為大陸心臟說的異名。英國的另一地緣政治學家戴維斯(W. Davis),繼續發揮了麥金德的觀點,他從權力政治的骯髒思想出發,“論証”美國和大不列顛海權的同盟之必要,而且認為英美兩國控制了包圍“大陸心臟”的濱海地帶,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³⁾。但這些改頭換面的“理論”,只是適應於英國的具體要求,為其統治世界服務而已。

1) 豪斯浩菲爾、冒爾合著(玉城奎譯):地政治學の基礎理論。第 41 頁。

2) 按在麥金德所著: (1) 不列顛和不列顛諸海 (1902); (2) 歷史的地理基礎 (1904); (3) 民主的理想與實際 (1919) 等書中都表示了同樣的觀點。

3) 參看戴維斯:地緣政治學與美國。載現代評論,1947 年 8 月號。

“大陸心臟說”對陸權給以很高估價，尤其在鼓吹德國地位的重要性方面，有力地鼓舞了該國的擴張主義。因此又被德國地緣政治學家接受下來。德國原為地緣政治學的老家，二次大戰以前，在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下，德國地緣政治學被認為官方的宇宙觀，豪斯浩菲爾等人就是承襲拉采爾、吉倫、麥金德等人一系列的荒謬觀念，在“國家為空間有機體(Raumorganismus)”、“空間觀念的萎縮，乃是國家滅亡的原因”等錯誤概念的基礎上，喧嚷着要求“生存空間”。這批反動學者們，為了迎合其主子們的要求，在地緣政治學中揉合了種族主義的罪惡思想，認為日耳曼人是優秀的民族，應該由他們決定世界的命運。他們提出了“德國文化語言區域”說，不顧歷史上文化上的真實情況，悍然主張一切德語佔優勢的地區，都應該由日耳曼人統治。他們在經濟上擴張的“根據”，就是荒唐透頂的奧太基(Autarkie)思想。這是說，“區內居民的一切給養都用本國的力量由本國的原料製成”，而不必和其他地區交換。與這一思想相適應，豪斯浩菲爾等修改了關於國界的看法，認為國界只是暫時的东西(雖然他們口中聲稱要有自然國界，但什麼才叫做自然國界，他們是可以隨意更改的)，沒有永久的意義，這就為德國的無止境的擴張伏下了“理論根據”。

豪斯浩菲爾等還直接參加了戰爭問題的討論，他的“防禦的地緣政治學”一書就是鮮明的代表。在這本書中他把政治、地理和軍事結合在一起，好像戰爭的本質取決於“土地所決定的地緣政治上的特點”，並由此引伸出種種荒謬的理論(例如所謂大陸心理、海洋心理等等)。這本書在納粹德國曾得到普遍的讚揚，充分暴露了它本身的反動性。

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反動思想在東方的日本同樣得到反映，1940年前後，許多德國的地緣政治學書籍被譯成日文，日本的反動地理學家也到處宣揚豪斯浩菲爾等人的觀點，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被大肆鼓吹，實質上它是日本法西斯匪徒們奴役東亞其他各國人民的工具。

戰後美國地緣政治學思想，基本上抄襲英、德。首先，它宣稱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優越，好像他們從來就有支配世界的特權。例如費爾恰德(Fairchild)的“種族與作為美國生活因素的民族”(1947)、亨丁頓的“文明的主要源泉”(1947)等書都反映了這種思想。其次，它也宣傳強權政治的重要。例如耶魯大學的斯匹克門(N.J.Spykman)寫道：“各種形式的暴力，包括戰爭與破壞在內，都是國際關係上所許可的。……強權就是一種能力，能使自己的意志支配別人，能逼着權力較少的人對它讓步”¹⁾ 這正是美國“實力

1) 斯匹克門：和平的地理。1944，第43頁。

外交”、“原子外交”的“理論”說明。第三,它還接受了麥金德“大陸心臟說”的概念。按照斯匹克門的公式:“誰能控制邊緣地區,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能統治歐亞大陸,誰就能決定世界的命運”¹⁾。這恰好是麥金德公式的倒式,而其仇視蘇聯的出發點則和麥金德相同。

戰後美國地緣政治學的特點是:根本拋棄所謂“生存空間”之類的半掩飾性的口號,露骨地提出世界統治權的要求。並在所謂“空權時代”的藉口下,向它的主子們慫恿獻策,來策劃對外的掠奪。例如斯匹克門所提出的區域集團主張,就是在“保持和平”的幌子下所籌劃的一種反蘇的侵略集團。按斯匹克門的意見,應該建立下列聯盟:大歐羅巴聯盟(包括中歐和東南歐)、拉丁聯盟(包括地中海各國)、大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聯盟(包括北海、波羅的海各國),斯匹克門主張聯盟的成員國,應放棄自己的政治獨立,只保有“文化上的自治”,政治上則服從於美英的支配。據說這是由於他們“缺乏”生存能力,乃是“政治上的廢料”²⁾。在亞洲,斯匹克門主張也建立同樣性質的反蘇集團。這樣,美國就可以“合法的”干涉並支配其他國家的內政。

斯匹克門這一主張,進一步發揮了麥金德的“大西洋統一體”的反動觀念,並已由美國統治階級予以執行,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巴黎公約(包括武裝西德)、馬尼拉公約、巴格達條約等等,都是侵略活動的具體證明。但應該指出,由於西歐廣大人民的反對,他們的陰謀進行得很不順利,它們的聯合也是極不穩固的。在東方,只有極少數的美國僕從國家聽從美國的呼喚,而雄壯的亞非會議吼聲,已經把美帝國主義震昏了。

包圍策略是美國地緣政治學的另一“理論”,它與“空權時代”思想密切聯繫,照哈特向的意見,由於航空和軍事技術的發展,“陸軍和海軍的戰線已經失去了國防上的意義,……國防上最重要的地理因素——地位和距離因子已經開始讓位了”³⁾。由此,他們主張廣泛建立海外基地,來包圍和平民主陣營國家。用他們的術語來說,這是所謂“海權與空權國”對付“陸權國”的辦法,是所謂“向心戰略”(這個“心”,最初指的是蘇聯,現在指的是整個和平民主陣營國家——作者),是所謂用“邊疆地區”之鏈包圍“大地心臟”。例如倭勒(G. Waller)在其“海外基地”(1944)一書中就露骨表示了這樣的主張。英國的戴維斯和倭勒也是一幫貨色。倭勒主張美國建立世界性的軍事戰略系統,要求永久佔有

1) 斯匹克門:和平的地理。1944,第5頁,43頁。

2) 斯匹克門這種荒唐思想,事實上是美英地緣政治學家的普遍想法,例如艾麥雷(Samuel T. Emery)在其“小國的時代錯誤”一文(美國地理學會會報,1948年第1期中)就認為:小國家應打消其本身存在的時代錯誤思想,而加入聯邦(按即斯匹克門的“聯盟”)。英國的非茲傑拉爾德在其“新歐洲”(1946年)一書中,也表明同一思想。

3) 哈特向:陸海空軍的地理定義。見美國地理學會會報,1947年,第1期。

在二次大戰中佔據的基地，並以可能的方法取得英國及其殖民地以及其他地區的基地。

包圍論雖是舊樣翻新，却完全符合於美帝國主義的要求。因此，它同樣已被普遍應用。例如美國在以北極為中心的包括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蘭、冰島、斯匹茨卑爾根等地基地的建立，美國還取得西歐（包括英、西德、法等國）、南歐和北非等地區的基地。在亞洲方面，光是日本一國就有美軍基地 850 處。琉球、南朝鮮、菲律賓、泰國以至果阿等區都成了美國的軍事據點，美國還正在瘋狂無恥地強佔我國的領土台灣。麥克阿瑟說過：“從這條島嶼鎖鍊，我們（指美國——作者）可以用空軍控制自海參崴至新加坡的每一個亞洲海港，並可防止任何進入太平洋的敵對行動。”¹⁾ 麥克阿瑟道出了美英統治集團的真正意圖與侵略本質。

美國地緣政治學的第三種“理論”是所謂“世界主義”與“流動邊界”（這實際上是納粹德國臨時國界說的翻版）。哥倫比亞大學的倫納可為代表。倫納在其“航空世紀人類地理學”（1943）、“全球地理學”（1945）等書中提出了全球性或世界一體的概念，認為在空中世紀，城市、國家，甚至大陸的界線都已消失，海洋已失去其難以征服和分割空間的障礙的意義，因此應該修改把世界分成兩個半球的陳舊看法，而採用對地球的世界主義觀點。倫納主張把“美國民族安全”界線推廣到西半球以外，主張美國應控制那些聯絡各大塊領土的“航空走廊”如歐洲北美間的冰島、格陵蘭、拉布拉達，北美遠東間的阿留申羣島、白令海峽，亞洲澳洲間的馬來亞、印度尼西亞。……以便在“空中稱霸”。²⁾ 這樣，美國的基地就可以囊括中南美、歐、亞、非、澳等洲，以及新西蘭、太平洋諸島甚至南極洲。倫納的觀點，充分反映了美國對外掠奪的野心。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說過：美國的“安全邊界”是在伏爾加河上，美國政府也公開宣稱：它在亞洲的“安全邊界”是在台灣海峽。正是這種“世界主義”與“流動邊界”說的體現。

在政治地理學中，也有一種極其反動的服務於帝國主義的思想，這就是克拉克大學范肯堡（Samuel van Valkenburg）的國家輪迴論³⁾。

范肯堡從地理環境出發觀察政治現象，認為位置、大小和面積乃是理解世界問題的“基礎”。范肯堡從拉采爾那裏承襲了錯誤的國家有機體論思想，胡謔出國家輪迴說這一“理論”。認為國家也有幼年、壯年、成年、老年的分期，據說幼年期國家誕生不久，無力對外，因而是穩定的。壯年期國家由於內部結構堅實，就要向外侵略，這是最不穩定

1) 印度代表辛格博士在亞洲國家會議上的報告引用。見人民日報 1955 年 4 月 9 日。

2) 按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從各方面為世界主義思想搜尋根據，例如說糧食是“有限”的，資源分配是不平均的，於是主張做世界性的通盤籌劃，而美國則“應該”為其主持人。從而為美國掠奪他國資源辯護。

3) 參看范肯堡：政治地理學要素。1946，此書代表着美國很多地理學家的觀點，自 1939—1946 年間，共印行了九版，可見其在美國風行之廣，流毒之深。

的因素。成年期國家对新領土“不感兴趣”，有時還“甘願放棄一部分領土”。老年期國家國力衰微，已經缺乏生存能力，因此常常遭受侵略。在范肯堡的邏輯中，由於世界不斷有壯年國家的存在，所以戰爭也就“不可避免”。而成年國家（在范肯堡的表上有美、英、法等國）則負有保護老年幼年國家、“抑制”壯年國家（當時他把德、日、意等國屬於所謂壯年國家，蘇聯正在走向壯年）的責任。

范肯堡還認為：在“成年期國家”中，英法的聲望已經一落千丈，其餘的更不足道，因此，美國應該握有這個世界領導權。也就是說，應該由美國來統治世界。范肯堡的基本觀點很明顯：（1）美國有干涉與支配世界各國經濟政治的“權利”與“義務”，因為它是強大的“成年國家”（我們知道，與范肯堡同時，倭勒曾宣稱美國是“少壯民族”，二者正互相矛盾）；（2）美國主要的矛頭應該對準蘇聯。因為德、意、日等壯年國家已被擊敗，蘇聯“正走向壯年”，所以要“抑止”它的發展（范肯堡之所以未提到中國，因為那時中國還在蔣匪反動統治的殖民地狀態之下）。這裏，范肯堡得出了與地緣政治學完全一致的反動結論。

人文地理學在政治上的應用，極盡荒唐之能事，其一切表現形式，都不過是些藉口與謊言，來和壟斷資本日益加甚的對外掠奪相配合。比如“大陸心臟說”這一概念，就是純屬子虛的東西。歷史上的巨大帝國，如歐洲的古希臘、羅馬以及英國都不是從所謂“大陸心臟”產生，而主要是產生於沿海地帶。這該如何解釋呢？而且，在資產階級地理學家中，就有與麥金德相反的意見，例如美國的葛勒石（G. B. Cressey）說：“亞歐大陸的重要區域乃在於它的外圍。……如果真有一個世界堡壘或心臟地的話，它亦應該位於北美洲而非亞歐大陸。……”¹⁾可見這種“原理”，歸根結底只是一種捏造罷了。

地緣政治學所叫喊不休的“生存空間”、“奧太基”、“臨時國界”等概念，它們的荒唐可笑極為明顯。斯大林曾經明確地指出：“當希特勒分子從事於聚集德國領土和收回萊茵省……時，還有相當的根據認為他們是民族主義者。但當他們已經強佔了他國領域和奴役歐洲各民族，……並開始去爭取世界統治時，希特勒的黨……從這時起已成為帝國主義的、掠奪者的、壓迫者的黨了。”²⁾地緣政治學家一切上述叫囂，在斯大林這一揭露下，都將無法躲藏，現出侵略的原形來。

所謂“共產主義威脅”，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蘇聯從一開始建國以來，就一貫奉行着與各國和平共處的政策。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為積極鞏固世界和平、擴大和加強國際合作而進行的鬥爭，在戰後更有着突出的表現。例如主張裁減軍備（並且已實行裁減），

1) 葛勒石：蘇聯國力的基礎。開明書店譯本，第209頁。

2) 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第25—26頁。

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對武裝西德和日本，主張締結全歐集體安全公約，和南斯拉夫關係正常化，和西德建立外交關係等等。中國也在積極地推行和平共處的政策，周恩來總理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成為整個亞洲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呼聲。這是對於“共產主義威脅”的宣傳的粉碎性的答覆。返觀帝國主義國家，大不列顛島國奴役了並繼續奴役着多於本土十倍的人口，法國在殘酷地鎮壓北非人民，美國的侵略基地遍佈於全世界，這些基地不僅是反對和平民主陣營的工具，而且是對當地施行政治壓迫與欺騙的據點。美英法等國以其雄厚的財政資本輸入落後國家與殖民地，實行經濟上的操縱與政治上的控制，使這些地區的人民日趨貧困與痛苦，這才是世界最大的威脅。

范肯堡之流理解到帝國主義要求戰爭，因此宣稱戰爭不可避免，但是，他們把戰爭的根源推到地理環境以及一些無中生有的東西上面，自己反而冒充起“和平救星”來，真是天下罕見的撒謊能手。

馬克思在論述到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後它的經濟科學特徵時寫道：“從此以往，成為問題的，已經不是這個理論還是那個理論合於真理的問題，只是它於資本有益還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超利害關係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無拘束的科學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的歪曲良心和邪惡的意圖。”¹⁾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戳中了一切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和地緣政治學（或政治地理學）的要害，揭露出它們的反科學的本質。

（四）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

人文地理學的偽科學性，係以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為其基礎，而主要表現於以下幾個方面：

1. 靜態的研究觀點

對於事物之靜態的研究，乃是所有人文地理學家的共同特點，而以赫特納為其代表人物。赫特納是本世紀來資產階級地理學方法論的大師，其“地理學的本質與方法”（1905）“地理學，其歷史、本質與方法”（1927）等方法論著在資產階級地理學界被推崇為“經典”著作，他的思想影響，廣泛及於歐、亞、美洲的許多國家。

就地理學的性質而言，赫特納認為地理學是一門“空間分佈的科學”。赫特納的出發點是：“空間上的結合，也和時間上的發展一樣，必須作特殊的研究。和系統的（或客觀的）及年代的（或歷史的、時間的）諸科學一道，也必須確立分佈的或空間的諸科學。”²⁾

1) 資本論。第一卷，第11頁，人民出版社版。

2) 赫特納：“地理學，其歷史、本質與方法”。俄文版，第107頁。

很顯然,他是把地理作為“何地”的科學,而和歷史科學、系統科學對立起來。

這種科學分類是違反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每一種專門科學都是研究物質運動的某種特殊形態,或者研究一系列彼此相關的運動形態。“任何科學的觀念形態,都符合於客觀真理,絕對自然。”(列寧語)因此它必須有正確的認識方法,首先要有反映物質的客觀運動形態的正確科學分類。關於時間、空間與物質的關係,恩格斯早就說過:“任何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及時間,離開時間的存在和離開空間的時間,是同樣大的荒唐。”¹⁾列寧教導我們:“世界上除了運動着的物質以外,沒有別的任何東西,而運動着的物質除了在空間與時間之內,就不能運動。”²⁾由此可見,時間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形式,物質乃是時間空間的統一。“物質沒有運動是不可想像的。”³⁾但赫特納沒有理解這一點,他把時間與空間從物質存在本身中隔離開來,使之相互孤立。他從物質之相對的暫時的靜止中尋求它的絕對的永久的規律,捨去內容與動態的研究而從事形式和靜態的研究,結果就不可避免地走到唯心論。

從研究方法來看,赫特納提出觀察自然、讀圖以及認識現象間的基本聯繫等等,表面看來,似乎正確(因為他所謂的基本聯繫實際上並非基本聯繫,後詳)。但他又認為:地理學的目的不在於某種普遍性的認識,而在於各個現實事象的認識。地理學的描述,在於多量的收集,記述個別的地理現象。但這不是作為某種概念和法則的實例,而只在其一切個別事象的認識上⁴⁾。可見,赫特納是把地理學的对象歸結為“個別的現實性”。他從具體的事實中剔除了現象間有機聯繫這一主要事實,只是把各種現象形式上綴合起來,其結果並不能認識事物的整體性或統一性,從而失去了科學的價值。

有人認為:人文地理學家的研究方法也有“演化”或“發展”的觀點與“歷史的態度”,例如赫特納說:“地理學也必須有發生學的觀點。”⁵⁾白呂納說:“我們研究人生現象,必須研究其演化的歷程。”⁶⁾可為說明。但就實際情況看來,赫特納所主張的發生學觀點,雖也見於他的一些著作中,但他對發展過程並無興味,僅僅注意於記述現象的發生,因此仍然失去了現象的動的方面⁷⁾。至於白呂納,雖然有時能從歷史上說明問題,但在具體研究中,他認為“應該先研究現在的地理現象,對於該現象的起源和沿革,則可暫時棄

1) 恩格斯:反杜林論。中國人民大學版,第110頁。

2)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解放社版,第203頁。

3)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版,第47頁。

4-5) 見“地理學,其歷史、本質及方法”。第200,121頁。

6) 人地學原理。第16頁。

7) 參看格利哥里耶夫等著(沈因明譯):地理學新論。上海辛鑒書店出版,第3—7頁。

置不問。”¹⁾ 這樣，所謂發展觀點，又被放在極次要的地位了。因此，在人文地理學家的研究方法中，基本上以直觀來代替一切，並未擺脫形而上學的窠臼。

另外，辯證唯物主義是把發展看做由量變到質變，看做舊的不斷消滅新的不斷產生的過程。而人文地理學家認識中的發展，並沒有消滅形而上學的範疇與概念。他們把發展只看做位置的变化，數量上的變動，而沒有質量上的更迭。例如他們注意到蘇彝士運河通航前後世界商道的变化，注意到美洲發現以後世界人口的移動，而對於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經濟地理的根本变化則避而不談。又如范背堡的“國家輪迴說”思想，就是從資本主義永世長存這一錯誤前提出發，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發展觀，絕非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觀。И. И. 格拉西莫夫院士(И. И. Герасимов)正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地理學家打算依靠‘歷史主義’的幫助，來給他們的推理披上一件科學的外衣，而這個‘歷史主義’是反動的歷史主義，它所集中注意的不是那些新的發展着的东西，而是那些從前是穩固的阻礙着新生事物的东西。‘它把自然發展過程看成是沿着封閉圓圈的運動，看成是一定限度內的平衡、衰老、腐朽和死亡的趨向。這些唯心的和形而上學的概念，被資產階級地理學家當作所有反動的新馬爾薩斯主義和地緣政治學捏造的思想基礎。”²⁾ 列寧寫道：“在20世紀(和19世紀末)，‘所有的人都同意’‘發展的原則’。——不過這種表面的、不加深思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乃是這樣一種同意：是用這種同意來絞殺真理和使真理庸俗化。”³⁾ 列寧徹底地指出了人文地理學這種方法論的真正惡毒性。

2. 錯誤的因果原則

人文地理學的方法論，還採取不正確的因果原則(白呂納避免“因果原則”一詞，改用“解釋原則”，本質上並無差別。參看本章第一節)。他們無視於社會發展規律，抹殺了社會生產制度，而把自然條件直接用來說明社會現象。例如白呂納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流浪遊民”(按即失業工人)的增加、社會秩序的紊亂，是由於工業都市和大煤礦造成的結果。亨丁頓說瑞典與西班牙鐵礦之運往英、德，是由於瑞、西兩國鐵多煤少，不得不以鐵就煤。這類言論的錯誤，一望而知，不值一駁。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並無工人失業、都市混亂現象，而移鐵就煤，主要是由於英、德生產發展的結果。只有赫特納的統一地理學觀點，才會把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加以混淆。人文地理學的這種錯誤的因果論，是在“科學”的幌子下建立起來的。例如白呂納以建立嚴密的科學對象為理由，以為“只有自然環境與人生活動相應的結果，才屬於人地學研究的範疇。”⁴⁾ 如果不受自然環境

1) 人地學原理。第599頁。

2) И. И. 格拉西莫夫：蘇聯地理學發展現階段的狀況與任務。地理學報，第21卷第4期。

3) 列寧：哲學札記。1947年俄文版，第239頁。

4) 人地學原理。第550頁。

影响或不顯著的社会现象,就不在人地学研究範圍之列。这样,他們就可以把次要的、非本質的因素与社会现象加以因果的联系,从而对社会现象的原因随意地进行唯心解释。但是,如所周知,人生活動是取決於社会經濟規律的社会现象,人生活動与社会經濟規律間的联系,才是主要的、本質的联系,撇開這一點,而只从自然条件这一片面的、不重要的角度去了解社会现象,只能有瞎子摸象式的、片面的因而也是錯誤的結論,而不可能符合於客觀真实。

他的三綱六目的分類也是不正確的。首先,他是从現象上、从人們的勞動加於地域的形式表現上來進行分類,他只看到地面上許多不同的“點子”,却不去認識這些“點子”在怎样的具体条件下形成,因此就攝取現象,擯棄本質,使人永远也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真实过程。其次,他从“地面事实”的角度出發,把房屋和道路“代表兩件基本人生事实”,而人口和各項生產事業反退居次位,这是本末倒置的。房屋、道路虽与当地环境有關,但其水平和等級則因生產力水平和社会關係而異。泥土小道和近代化公路可以在同样的环境內出現,鋼筋混凝土的建築与茅棚土屋可以毗鄰共存,这全然是社会的原因,至於資本家、地主,与工人農民住宅的差別,更非自然条件所能解釋。因此,只有首先抓住社会现象的主要环节——生產,然後才能对其餘的次要事象(如房屋、道路等)有深刻了解,把房屋、道路放在生產之上,把房屋放在人口之上,都是混淆主从的根本錯誤,也正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論的具体表現。

人文地理学之地理环境与社会现象間的因果論,是从外因決定社会發展的錯誤觀點出發的。毛澤东同志教導我們說:“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事物內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內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內因而起作用。”¹⁾ 所以,事物內部对立矛盾的永恆不斷的鬥爭与統一,才構成事物的發展。例如社会的發展就是在社会內部生產力与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中進行,地理环境只起条件作用。撇開社会內部的生產,而从外部环境去尋求社会發展的原因,結果就只有墮入唯心論与不可知論的泥坑。

3. 唯心論与不可知論

人地学派的心理因素說、選擇力說,在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論中佔有重要地位。它們是在“环境論”道路不通之後的“救命丹”,实际上是不可知論的表現。白呂納曾經企圖从自然环境中找出心理因素的根源,但又發現心理因素隨人隨社会隨時代而变遷,“同

1) 毛澤东: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二册,第767—768,769頁。

樣的心理作用不必全是同一自然環境的產物，反之，不同的自然環境也可引起同樣的人生活動。……各地俱有人生活動彼此雷同，而地理環境大相懸殊的。”¹⁾ 白呂納看到了同一自然環境內矛盾的人生事實，不能做出正確的解釋，就籠統歸之於他自己也捉摸不住的“內心的動力”或“脆弱的心理要素”，其結果正充分暴露了它的唯心論與不可知論的面目。這種面目，在赫特納、鮑曼以及其他的人身上同樣可以看到。赫特納在其“地理學中的規律性與偶然”一文（1935）中，除了重複統一地理學的觀點以外，基本上否定了規律性的存在，而把偶然性作為地理學中佔支配地位的東西。他把氣候上的多變歸之於偶然，而“經濟生活的變化比那天氣的變化更少規律性。”赫特納說：“在我們的討論中，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人類天性上的偶然性，特別是人類行為上的偶然性——即任意的行為。”²⁾ 鮑曼也認為在社會現象中，人們極難甚至是不可能預見性³⁾。這都是康德與斯賓塞等不可知論思想的承襲。

近年來，人文地理學的唯心論與不可知論的方法論也更加鮮明了。例如美國地理學家約翰·雷特(John K. Wright)在其“不知道的地方：想像力在地理學中的地位”一文中（載於美國地理學會會報 1947 年第 1 期）率直主張地理學的研究“是一個主觀過程，因為它不用相當證據的客觀判斷與考量，而用個人對零星事實的印象。”雷特向人們介紹了“美學想像”的地理學研究法，用以取消經濟地理學中對於各個現象的相互聯繫及其內在規律性的研究。事實上，現在資產階級人文地理學的著作，普遍是些對於一地地理對象之表面的描寫或是一些經驗性的記述，他們以逃避規律性和社會關係的方法來轉移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對。雷特只是公開的道出叢中真象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認為世界是可知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就是要掌握事物運動的規律，從自然社會的必然性中，從它的合乎規律的發展中去認識它。“把規律從科學中驅逐出去，事實上只是為宗教信條張目。”（列寧語）但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忽視偶然性的意義，而是把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地統一起來；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必然性以偶然性為其補充，通過一切偶然性來開闢自己的道路。正是由這一正確的思想方法出發，一切社會現象才得到完備的、合乎規律性的解釋。

最後，人文地理學者一口咬定地理環境終於支配人生，人類最多只能改變自然、修理自然、藻飾自然的說法，也是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的表現。在第三章第一節

1) 人地學原理。第 563 頁。

2) 參看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出版的田家譯：為美帝服務的資產階級地理學。第 123—130 頁，中華書局版。

3) 參看鮑曼著：地理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第 32 頁。

裏，我們曾經強調指出人的積極創造作用，指出環境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範疇。但是，如果把人類的戰勝自然、改造自然理解為人類跳出地球以外，理解為改變自然規律，那就大錯特錯了。人的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是指的人們學會掌握自然發展規律，把自然界所潛藏的種種可能性變為人們實際利用的現實性，人們愈能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就愈能估計到自己生產行為的較遠的自然影響，因而愈能統治自然界。列寧指出：“當我們不知道自然規律的時候，它是獨立地在我們的意識之外存在着和作用着，把我們變成“盲目的必然性”底奴隸。但當我們知道了不依賴於我們的意志和意識而獨立地作用着的這個規律的時候，我們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¹⁾ 恩格斯說：“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僅僅是因為我們……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而已。”²⁾ 斯大林說：“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規律，估計到它們，依靠着它們，善於應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把自然的破壞力引導到另一方面，使自然的破壞力轉而為社會造福。”³⁾ 由此可見，人文地理學家所謂人類支配環境的方法愈多，則受自然的控制愈甚的論點不過是說明人們還沒有正確完備地認識自然規律而已。人文地理學家無視於變化不已中的人地關係，無視於人們在征服自然中的巨大成就，而侈談地理決定論，說人們不能跳出地球，正是以唯心論觀點把一切災難歸諸自然，為資本主義制度永恆性辯護的明顯表現。

四. 人文地理學思想在中國的影響

20 世紀以來的中國地理學，是沿着資產階級地理學發展的方向進行的。三十多年來（自民國初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地理學的水平 and 過去相比，肯定地有了顯著提高。例如對於我們周圍自然環境的認識，對於各地區自然條件的分析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績。地圖事業的發展，野外考察方法的採用，也為區域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過，這都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副產品，而從思想方法、科學體系來看，我們的地理學顯然是很有問題的。例如資本主義國家人文地理學的思想體系與方法論，就全部的為舊中國地理學界所接受；資產階級人文地理學的一些表現形式，同樣在中國也得到反映。

人文地理學之被大量介紹到我國來，是從“五四”以後開始的。毛澤東同志說：“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⁴⁾ 人文地理學正是這種帝國主義文化之一。

1)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解放社版，第 218 頁。

2)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 146 頁。

3)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 2 頁。

4)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冊，第 666 頁。

執行傳播人文地理學任務的，有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教育機關及其代理人，有我們本國的地理學家，我國過去留學資本主義國家的地理學家們，尤其起了積極的主要的作用。我國地理學家們，全盤接受了人文地理學的思想體系與方法，以此教育青年，以此著書立說。西洋人文地理學著作紛紛被翻譯過來，特別像亨丁頓的“人生地理學原理”（1930年，商務出版）、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¹⁾、森普爾的“地理環境之影響”（1937年，商務版）和鮑曼的“戰後新世界”（1927年，商務版）等書影響很大。它們被認為是理論上、思想方法上具有“經典”意義的著作，在研究問題時一般以它們所表達的思想為規範。1925年以後，中國地理學家的論文、專著日益增多，其中人文地理學的作品佔有主要地位。本文不擬對這些作品加以列舉與分析，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稱為“人文地理”、“人生地理”、“文化地理”、“人地關係論”或“自然與人生”等著作，基本上都是重複白呂納、亨丁頓等人的論調——地理決定論。例如有人認為：“人類社會不是一個能脫離他所在的和他所工作的環境而能研究的抽象組織。假使我們離開那形成社會的主動力去研究社會，所得的結果必是虛而不實，因為人羣社會是他所佔住的那地方的產物。”²⁾ 有人認為“大之如國家興亡，小之如人類物質文化（如經濟、交通、居住等）或精神文化（如言語、宗教、藝術、社會組織等）都逃不了地理環境的支配。”³⁾ “地理的本體，雖由人與地兩要素所構成，實則兩者具有不可分解的因果關係”。而地理的“目的，是要置重於人地兩者的交互作用或因果關係的闡明。”⁴⁾ 張其鈞在其“戰後新世界”譯者序中公開發地寫道：“歷史所以解釋過去，地理所以解釋現在。”在另一文中，他把地形作為中國地理的第一綱領，氣候為中國地理的第二綱領，好像只要地形、氣候二者，就能構成“科學的地理之基礎。”⁵⁾ 像這類觀點，在解放以前的每一篇人文地理（其中也包括區域地理）作品中都可以見到。

在經濟地理學的書籍中，也表現了赫特納的“經濟是地域的屬性”這一錯誤觀點，把經濟現象歸結為地面的產物。例如1948年偽正中書局出版的“經濟地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從該書中我們看不出經濟現象和社會經濟制度間的任何聯繫，因而也就無從認識經濟現象的本質。

關於最反動的地緣政治學思想體系同樣在國內也有反映。例如沙學浚的“國防地理新論”在很多地方都表現了豪斯浩菲爾的觀點，該書最後一篇還系統地介紹了豪斯浩

1) 此書有二譯本，一為譚亞達所譯，名“人文地理學”；一為任美鏗、李旭旦合譯，名“人地學原理”。

2) 黃國璋：社會的地理基礎。第4頁，1932年。

3) 葛綏成：世界文化地理。序，1935年。

4) 譚亞達：高中本國地理。編者的話，1933年。

5) 張其鈞：近二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地理學報，2卷3期。

菲尔的“防禦的地緣政治學”一書的內容。這是一本極其反動的著作。在1948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世界政治地理”一書中同樣也有許多荒唐的論點，例如關於麥金德“大陸心臟說”的讚賞以及所謂空權時代地理新形勢的鼓吹等等。范肯堡的國家輪迴說，在清華大學地學集刊第六卷的某些論文中也都有所反映與贊同。……

在這一思想體系影響下，我國對於地理學對象的認識就採取了赫特納統一地理學的觀點，而把地理學當做所謂“橋樑科學”。並把地理學的研究範圍，嚴格地限制在白呂納的規定中¹⁾。大學地理系的課程，一般是从自然地理開始，經由“人生地理”而到“區域地理”的講授，却沒有關於國民經濟發展史的基本訓練，更談不上馬列主義世界觀與思想方法的培養。這種片面的培養方法，就造成了青年地理工作者的片面觀點。在過去許多人文地理學的作品中，隨處都表現了形而上學的觀察事物的方法，而其通用的公式，是从自然到人生，關於社會經濟，只有一些表面的、現象的描述，而缺乏本質的分析。對於它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原因，縱然偶爾也略略談到，那也是些次要的、枝節的東西。這樣就好像把人類社會現象放在一面改樣的鏡子面前，失去了原來的真實面貌，從而也就抑損了作品本身的科學意義。正如И. И. 格拉西莫夫院士所說：“這些作品常常有一些寶貴的实际材料，却為極嚴重的方法論上的缺陷損毀了。尤其是所謂‘庸俗的地理主義’，經常過度歪曲各種地理現象，主要是經濟地理現象的真實原因。”²⁾

因此，在對待實際問題時，往往採取不正確的处理方法，例如關於區域的研究，一般都以自然區代替經濟區，混淆了二者之間的區別。關於中國地理問題的探討，則搬用帝國主義分子杜撰的“理論”（例如馬爾薩斯人口論、環境限制論等），從中國當時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出發，運用資源/人口的公式，斷言中國人口過剩，說中國人民的貧窮是由於“地大而物不博”，是由於“人口過多”，却無視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大敵人的壓榨。例如在“地理學報”和“地理教育”的創刊號裏，就首先提出了“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我國地大物博人稠之真相”這一類的問題，其結論是：“吾國之地誠大，然可用之地實不大，吾國之物產雖博，然為供給過剩人口之消用，則殊感不敷，吾國之人固多，較之地力所能給養之人尤多。”³⁾又說：人口問題的解決，移民墾荒是“治標的辦法”，節育优生才是“治本的辦法”。移民墾荒只是“暫時的解決，非長久之計”，“到了中國無地可墾的時候，人生依然如今日之窮，仍然站在‘死亡線’的边上。”⁴⁾“中國貧窮問題”

1) 這是一種普遍承認的概念。例如王成組在“什麼是科學的地理”一文中寫道：“新地理學只認定人地關係的研究做它的範圍，”就可說明。（文載“科學”，14卷10期，1930）

2) И. И. 格拉西莫夫：蘇聯地理學發展現階段的狀況與任務。地理學報，21卷4期。

3) 胡煥庸：中國地大物博人稠之真相。地理教育，創刊號。

4) 見張印堂：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地理學報，創刊號。

(1935年偽正中書局出版)一書作者甚至斷言：“中國氣候之弱點以及旱災、水災及其他災害，……具有極偉大之摧毀勢力，且有引起貧窮之永久性的可能。”(第165頁)從這類觀點中能夠得出什麼結論呢？說它們的作用在於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罪惡統治辯護，以麻醉中國人民，把我國的貧苦根源完全歸之於地理條件，而於社會制度無干，不是很合乎邏輯的推論嗎？

但這些觀點的錯誤是十分顯而易見的。首先，他們以為中國農業人口佔全人口 $\frac{3}{4}$ 以上，就只從農業出發，而丟掉了工業，好像中國沒有發展工業的可能，這對於半殖民地中國的人民，無疑起了麻醉的作用。其次，他們忽視了工業發展對農業運輸業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錯誤地襲用帝國主義分子亨丁頓、葛勒石等人的論點，以為中國不但可耕地已經無多，而且農田生產力也達到“極限”，因此才得出上面錯誤的結論，並導致“中國沒有發展希望”的推論來。但新中國生產戰線上的實際成就雄辯地駁斥了這一類的觀點。中國人口雖然大大增加，而人民生活水平不是降低而是顯著地提高了。由於農業合作化採用蘇聯先進的作物栽培經驗以及改進農田耕作技術，我們的農業生產迅速提高，而單位面積產量水平還趕不上蘇聯，說明所謂農業生產“極限”說，根本是無稽之談。

最後，我們還必須揭露帝國主義分子葛勒石對我國的毒害。葛勒石在中國多年，以上海滬江大學教授身份在我國進行偵察活動。他的有關於中國的主要作品有兩本，即“中國的地理基礎”(1934)¹⁾和“亞洲之地與人”(1944，其中一部分講中國)，它們都被譯成中文，在舊中國地理學界，“被視作一冊珍貴的參考用書。”並且有些中國地理學家還公開予以介紹捧場。

葛勒石在這些書中所表述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

首先，他強調了中國人口的“壓力太大”與“過剩”。在“中國的地理基礎”裏，他劈頭就說：“中國人民生活的根基，深入到土地裏面。……樸實的農民勤勉地操作着，在極小的田地裏，勉強度着貧困的生活。無數農舍的聚落，……指明人們佔有土地的緊張嚴重性。……”(中譯本，第1頁)他接着說：“中國人民‘利用天然富源已臻善境，除了新的外來的力量刺激它改變，那是很少有內在的改革的。’”(第2頁)這樣，葛勒石就把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固定在不變的水平上。葛勒石從許多方面“分析”了中國的土地利用情況，認為“除了東北的北部以外，幾乎一切便於耕作的地方，都已利用到了極限。”“中國的一切部分在其可利用的生產方法之下，主要的都已充滿了它的容量。”(第15頁)這裏，葛勒石武斷地替我們宣佈：中國已經人滿，中國已很少可耕未耕的土地。但解放以後，據

1) 中譯本分二冊，一為“中國的地理基礎”，一為“中國區域地理”。

初步調查，我們的可耕荒地有 15 億畝之多，比葛勒石寫書時的 13 億畝耕地超出一倍以上。

葛勒石還對中國農田單位面積產量水平作出了荒謬的論斷，認為中國“土壤的耕作已近經濟的極限，”很難得到大量的穀類產量（第 72 頁）。因此主張必須從數量上控制中國人口。這種產量極限論，威廉斯早已科學地加以駁斥（見前第三章第二節）。至於中國的穀物產量，不但解放後年年有所增長，而且 1955 年糧產已超過了戰前最高糧食年產量 28%。隨着我國向社會主義的邁進，我們的農業生產力還將不斷有所提高。葛勒石的罪惡目的，不過是要把中國人民貧困的原因諉之於人口與自然條件，為三大敵人的壓榨進行隱蔽與掩飾而已。

葛勒石還以“友人”的姿態對我國的繁榮表示“關懷”。在他看來，中國的發展“似乎農業較之工業還來得可能。”（頁 74）據說中國“缺乏鐵礦”，“非常缺乏石油”，“沒有大量銅礦儲藏象徵”，因此中國工業活動“無大希望”，“欲使其有適當的發展，尚須歷數十年或數百年。”於是葛勒石就在“科學”外衣的掩蓋下，明目張膽地把中國規定為一個听任帝國主義剝削的殖民地性的農業國家。

在“亞洲之地與人”中，葛勒石基本上抱持同一觀點。鑒於中國人民在對日戰爭中所表現的英勇與力量，不能不承認中國的工業發展“仍具希望”，但葛勒石又從他的主子們的利益出發，大肆鼓吹中國市場和美國生產的關係。葛勒石兇狠地寫道：“將來或中國拒絕外援（外援應讀為美國的經濟侵略——作者），如此則於中國於世界俱非幸事。”（第 1321 頁）很顯然，葛勒石的意思是：首先要想尽各種理由，淪中國為永久的農業國家，萬一中國要工業化，那就必須接受美國的投資，而不能走蘇聯的道路。

歷史的進程無情地摧毀了葛勒石的一切謬說。幾年來勘探的結果，已經初步證明中國有豐富的礦藏，中國沒有按照葛勒石所安排的工業化日程，在人民民主政權成立以後不久，就開始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偉大事業。但這是在中國偉大友邦蘇聯的無私援助之下進行，而美國所給予我們的則是“封鎖”與“禁運”。中國人民清楚地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應該指出，在帝國主義分子中，葛勒石不過是其中之一，其他像亨丁頓、卜凱、拉鐵摩爾等人都曾對中國社會現象進行惡意的歪曲，散佈有害的毒素，我們必須予以清算，使新中國地理學健康前進。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經過不斷的理論學習和近來對於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的批判，對於人文地理學思想體系與方法論的危害性，已有逐步深入的認識，不少地理學家並已對自己過去唯心的錯誤的地理學思想做了檢查，這是進步的可喜的現象。但不應忽視，

在解放後出版的地理書刊中，資產階級人文地理學思想殘餘，並未得到徹底的肅清，例如盛敘功的“世界經濟地理”(1950年中華書局版)一書，就仍然襲用赫特納的方法論，把經濟地理作為經濟現象的空間分佈的科學，並在若干論點上陷於唯心的、形而上學的錯誤。作為中國地理學會主要學術刊物的地理學報，在1950—1952年各期中，也刊載了多篇在立場、觀點、方法上犯有原則性錯誤的論文。褚紹唐的“新中國地理”(1954年1月版)，雖然具備許多優點，而在處理經濟區域時，以自然地理的差異作為劃分經濟區的主要條件，其結果很自然地帶有環境決定論的色彩。另外，在某些地理論文或報告中，往往教條地搬用斯大林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而缺乏地理現象的歷史分析，也有人很習慣於引用馬恩列斯的詞句，但在實際研究時，卻又撇開馬克思主義原理，只從自然條件分析地理事實，結果使馬克思主義原理成為空洞的具文。所有這類現象，說明環境決定論思想還沒有被徹底摧毀，自然條件在社會經濟現象中地位，還沒有得到正確的处理。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地理科學，每一個地理工作者還應該對人文地理學思想殘餘進行深入的鬥爭。

但必須指出，在與環境決定論進行嚴肅的鬥爭中，必須同時反對漠視自然條件、取消自然條件的傾向。“有些人在研究社會經濟現象時，把構成社會物質生活的地理環境諸條件視若無睹，對於客觀存在的自然條件對社會發展的一定影響與作用，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這些以“左”的姿態出現的唯心論的偏向，也是值得檢查和批判的。”¹⁾

人文地理學的思想體系屬於資產階級思想的範疇，在我們殘餘的資產階級思想中，它可以隨時獲得滋長的基地。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地理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以及地理環境在社會生產中作用的學說為基礎的科學，它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為其方法論的基礎。這是兩種對抗性的思想體系，永遠沒有和平共存的可能。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鑽研馬恩列斯和毛澤東同志的經典著作，為徹底剷除人文地理學思想體系，穩固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地理學思想體系提供有利條件，並使後者得到正常健康的發展。

1) 中國地理學會南京分會批判唯心主義思想座談會上李旭旦同志的發言。見地理知識，1955年6月號。

HUMAN GEOGRAPHY SERVES IMPERIALISM

Chang Tung-chu

(Nanking University)

Human geography is one of the ideological weapons of imperialism in the modern capitalist world. It has for its research subjects nature and human life, or in other word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basic thought content of human geography is the vulgar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with idealistic and metaphysical viewpoints as the basis of its methodology. Therefore, human geography is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geography.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human geography was laid by K. Ritt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perfected by F. Ratzel in the second half of it (both were German geographers). This was a period of time when capitalism declined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developed and became sharper with each passing day. Ratzel inherited this prevailing viewpoint of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from Montesquieu, and developed it. He tried to use this point of view to explain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to conceal the existing sharp contradictions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of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to politics, he established the absurd geopolitics to meet the needs for the expansion of German monopolists. At present, the dogmatic view of determinism, 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geopolitics, is very much in vogue in the mor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because determinism has many defects and can no longer rationalize itself, the theory of possibilism started by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and J. Brunhes came into existence in France. But this possibilism, merely a variant of determinism, is in essence no different from the latter. It merely fi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more skilfull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bourgeoisie.

Human geography serves imperialism chiefly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1. Human geography disto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olding that geographical circumstances determine all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at natural conditions give birth to the progress as well as the backwardness of society and that geography is no other

than human ecology. Human geographers neglect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of mankind, and purposely tried to mix up the law or movement of human beings with that of animals and simultaneously to distort the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and of society. Consequently, these geographers exaggerate the function of geographical circumstances and at last reach an unscientific conclusion.

2. On the basis of the ideology of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human geographers accept the absurd conceptions in Malthus' "Theory of Population", in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in the theory of races. They try hard to make use of these conceptions to explain the poverty of the great masses of the labouring people and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colonial countries. They use these unscientific theories and openly advocate the artificial reduc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colonial countries and the rule of "inferior races" by "superior races" (as to which are the "superior races" widely divergent views are held). However, the Marxist-Leninist science has completely shattered such a false scientific theory and the increased class-consciousness of the great masses of the labouring people and their strong opposition to colonialism in all the subordinate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also torn the mask off such a false theory.

3. While unlimited expansion and aggression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imperialism, geopolitics makes efforts to justify it in the light of geography. Geopoliticians even conceive such concepts as "State as an Organism", "Heartland", "Lebensraum", "Cycle of nation", etc. to justify the "reasons" for the expansion and the enslavement of the great masses of the people by imperialists. At present, on the pretext of "Air Age", authorities on geo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penly create such a term as "global geography" for the purpose of controlling the whole world. Now human geography has degenerated into an active accomplice of imperialism and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science.

4. The methodology of human geography is in essence idealistic and metaphysical. Human geographers adopt: (1) the static view in research, denying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ment; and (2) the erroneous principl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mistakenly trying to link the secondary and unessential factors in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phenomena. They do not seek the cause of development of phenomena from within. Naturally they are led to idealism and agnosticism. As a result, they inevitably misinterpret social phenomena, thus propagandizing "eternalism" of capitalism.

The ide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human geography had tremendous influ-

ence in old China: for over 30 pre-liberation years, it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and established itself in a dominating position among the Chinese geographers. Various forms of expressions of the ideology of human geography may be found in China, and Chinese geographers are not yet exempt from its influence to a more or less degree.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oroughly the ideology of human geography from and to establish the ideology of Marxist economic geography in our new China, we must study more carefully the classical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Stalin and Mao Tze-tung, and criticize more carefully and thoroughly the false ideology of human geography.